

[https://farid.ps/articles/germany\\_rewriting\\_holocaust\\_responsibility/zh.html](https://farid.ps/articles/germany_rewriting_holocaust_responsibility/zh.html)

# 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重写对大屠杀的责任

德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政策，被称为“国家理性”（**Staatsräson**），常以对大屠杀——即对六百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愧疚来正当化。然而，这一叙事掩盖了自私的动机，旨在通过将大屠杀的责任归咎于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哈吉·阿明·侯赛尼（Haj Amin al-Husseini），来重写历史。德国利用死者的沉默和压制活人的反对意见来转移其罪责。本文论证，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更多是为其自身利益服务，而非道德上的赎罪。

## “国家理性”与大屠杀愧疚叙事

自二战后，德国通过赔偿和支持以色列来面对其对大屠杀的责任，将其呈现为道德义务。2008年，默克尔总理称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这一立场被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重申。2024年，肖尔茨表示，即使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因加沙战争罪行被国际刑事法院（ICC）发出逮捕令，他也不会在他们访问德国时逮捕他们。德国还镇压反种族灭绝抗议活动，称其为反犹主义。这表明其动机超越了愧疚，包括通过指责巴勒斯坦人来重写历史。德国对歪曲事实——如夸大侯赛尼角色——的沉默，暗示了一种转移罪责的策略。

## 历史歪曲：归咎于哈吉·阿明·侯赛尼

哈吉·阿明·侯赛尼，1921-1937年耶路撒冷大穆夫提，自1941年起与纳粹合作，制作反犹宣传并为党卫军（Waffen-SS）招募人员。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 2016）、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 2014）和奥弗·阿德雷特（Ofer Aderet, 2015）的研究证实，他对大屠杀的决策没有影响。种族灭绝始于1941年，早于他1941年11月与希特勒的会面，由《我的奋斗》（1925）中的纳粹意识形态驱动，并由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艾希曼执行。

尽管如此，夸大侯赛尼角色的说法依然存在。2015年，内塔尼亚胡暗示侯赛尼启发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这一说法被Yad Vashem驳斥。德国对这些歪曲的沉默助长了将巴勒斯坦人与纳粹罪行联系起来的叙事。侯赛尼于1974年去世，无法反驳指控，使其成为理想的替罪羊。

## 德国政策的自私动机

德国支持以色列服务于多种自利目的：

1. **全球形象**：与以色列结盟使德国显得已改过自新，掩盖其作为大屠杀肇事者的角色。
2. **转移罪责**：容忍关于侯赛尼的神话将注意力从德国的责任上转移，涉及20万至50万名执行者（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3. **内部控制**：禁止亲巴勒斯坦抗议（2023-2024）压制辩论，强化“国家理性”作为绝对义务。
4. **地缘政治**：支持以色列与美国利益一致，确保经济和军事伙伴关系。

这些动机表明，德国的政策旨在最小化其历史罪责。

## 让死者和生者沉默

指责侯赛尼利用了他的死亡——他无法抗议。与此同时，德国通过镇压反种族灭绝抗议活动让活人的声音沉默，称其为反犹主义。这将对以色列的批评等同于否认大屠杀，扼杀了关于加沙的辩论，自2023年以来已有超过4万人死亡（联合国）。德国的巴勒斯坦人面临监控和限制，进一步边缘化。这种双重沉默强化了指责巴勒斯坦人的叙事，证明了德国政策的合理性。

## 真正的责任：诚实面对过去

德国对大屠杀的愧疚需要诚实面对，而不是指责巴勒斯坦人。种族灭绝是德国的罪行，如纽伦堡审判所确立。为了赎罪，德国应：

- 揭穿关于侯赛尼的神话，防止巴勒斯坦人被指责。
- 允许公开讨论以色列的行为，不将其等同于反犹主义。
- 批判性地评估对被控战争罪领导人的支持。

若不如此，“国家理性”将成为服务其利益的工具，而非道德义务。

## 结论

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大屠杀愧疚为由，是一种自私的策略，旨在重写历史。通过容忍关于侯赛尼的歪曲和压制反对意见，德国指责巴勒斯坦人，利用死者的沉默并边缘化生者。这转移了德国对大屠杀的唯一责任，服务于国际形象修复、内部控制和地缘政治目标。真正的赎罪需要拒绝歪曲事实，放大被边缘化的声音，而不是延续以牺牲历史正义为代价掩盖德国罪责的叙事。